

《诗经》中染料植物与服色文化关系的探析

吴江玲¹ 唐 圣²

(1.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;2.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,广东 湛江 524048)

摘 要:《诗经》中蕴含着染料植物的一些重要描写信息,而染料植物又与当时的服色密切相关,服色又与信仰、政治意蕴互涉。对这些染料植物与服色关系进行探析,有利于更加深入理解《诗经》的文化内涵。通过文献研究,认为一方面在万物有灵观念下的天地崇拜,对当时人们的服色偏好起到一种异向作用。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,在政治等级制度下服色起到辨贵贱、别尊卑的政治效果,一直被统治阶层惯用。

关键词:《诗经》 染料植物 服色文化

《诗经》作为一部能够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,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此外,它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。值得关注的是,仅305首诗中,有近130首提到植物,其中有6首提到了染料植物,这与周代专门设置的“掌染草”一官职相印证。根据潘富俊的统计结果,《诗经》共涉及5种染料植物,它们是绿、茹蘼、枏、蓝和柘。^[1]“绿”即如今的荇草,是一种可以染黄、染绿的植物,古代主要用于染制官服。“茹蘼”(今名为茜草)这种染色植物,其“紫赤色的根部含茜素及茜草酸等成分,为红色染料,专供染御服之用”^[2]。“枏”乃今之鼠李,亦为染料植物中的一种,其未成熟的核果以及树皮可以制黄色和绿色的染料。《小雅·采绿》中的“蓝”,即蓼蓝,它是一种被用于染制衣物的蓝色染料。《大雅·皇矣》中的“柘”,其“心材可提制黄色染料,称为‘柘黄’,专门染制黄色衣物。”^[3]可见,染料植物与服装色彩密切相关。因为染料植物是经典文化《诗经》的一部分,所以与其相关的服装色彩也无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但是,学者们多从文化意蕴的某一方面对《诗经》中的植物展开探讨,或是信仰文化,^[4]或是景观文化,^[5]或

是农耕文化等。^[6]而且,从服装色彩来看《诗经》中染料植物文化意蕴的研究较少。本文以染料植物与服色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,基于《诗经》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,试图从服色文化角度探究染料植物的信仰、政治和审美意蕴,从而得出《诗经》中的服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,即中国传统文化在根本上规定了《诗经》中的服色文化,因而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 染料植物与服色的信仰意蕴

1.1 万物有灵观念下的天地崇拜

《诗经》时代,人们相信万物有灵。正如《礼记·祭法》所说,“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,其万物死皆曰折,人死曰鬼”^[7]。据这一文献记载,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认识:天地是万物生命的主宰,它们控制了万物的生,且这种生被视作万物的“命”;和人一样,万物也会经历死亡,即所谓的“折”,但人死则称作“鬼”。此外,范明华认为,在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先秦社会,巫术观念把天地宇宙看作一个有灵魂的存在,并且,“作为一种原始宗教,巫术不仅相信各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存在,而且认为人类可以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与之形成

收稿日期 2017-09-13 修回日期 2017-10-05

通信作者 唐圣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

“交感互通。”^[8]

在万物有灵观念的作用下,周代人普遍崇拜天地,并借服色表达了一种对天地的信仰之情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有言:“地载万物,天垂象,取财于地,取法于天,是以尊天而亲地也,故教民美报焉。”^[9]在当时的人们看来,自己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天地的滋养和庇护。那时,由于文明尚处于蒙昧时期,所以人们普遍表现出对有灵天地的敬爱。这种敬爱天地的情感,对时人的服色偏好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,同时也影响了染料植物的选用。

1.2 染料植物与服色的天地信仰

人们对染料植物所染衣裳的选择体现出信仰观念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盖取诸乾坤。”^[10]并且,高亨认为,此处的“垂”应借为“缀”。对于“缀”,《说文解字》言:“缀,合箸也。”^[11]合箸就是联结二物使其合为一体。因“缀”为缝制之意,缀衣裳即缝制衣裳。而且黄帝、尧、舜创造衣裳的想法源于《易经》中的乾坤二卦,其中乾为天,坤作地,上下各居其位。^[12]而对于人的服装,上体着上衣,下体穿下裳,因此,上衣下裳成了中国最早的服装样式。上衣的玄色取于黑夜中天空的色彩。下裳的颜色取自大地兼有赤黄的本色,即人们常说的“纁”色。裳的这种赤黄颜色,主要



图1:中国古代帝王的礼服

由《诗经》中作为染料植物的茜草染制而成。《尔雅·释器》有云:“一染谓之纁,再染谓之赭,三染谓之纁。”^[13]据此可知,周代的职官染人对茜草进行三次染色处理后,即可获得像地色的纁色。基于“玄衣纁裳”象征着天地之色,所以这种服装多用作礼服,以此表达人对至尊至上天地的敬爱之情(图1)。可见,从设计构思到色彩选用,衣、裳都受到了天地崇拜观念的影响。

足衣(此处主要指今人的鞋)色彩的获取与染料植物有关,并体现出人们的天地信仰观念。周代专门设置了“屨人”一职官,以负责和管理周天子和王后的鞋。王和王后所穿的鞋有屨、舄之分(图2~图3)。而且,仅就鞋中的舄来说,他们所穿亦有别。王的舄分为赤舄、白舄和黑舄;与之相对,王后也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舄,即玄舄、青舄、赤舄。赤舄、青舄之色分别由染料植物茜草和蓼蓝染制,其中的蓼蓝虽是一种蓝色染料,但荀子在《劝学》中说:“青,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^[14]。在周代,王穿赤舄时,王后应穿玄舄,并依此类推其他舄的颜色搭配。足衣色彩的这种搭配方式,表现出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仰之心。在时人看来,就地理方位而言,南方较北方更多地受到太阳光的照射,且肉眼所见的阳光之色为赤色,因此,人们用赤色来象征向阳的南面;由于北方背对阳光、处于阴面,而与黑色相关。结合中国的传统观念,乾主阳、成男、即天,坤主阴、成女、即地,所以,象征天的王的赤舄应与象征地的王后的玄舄相配合而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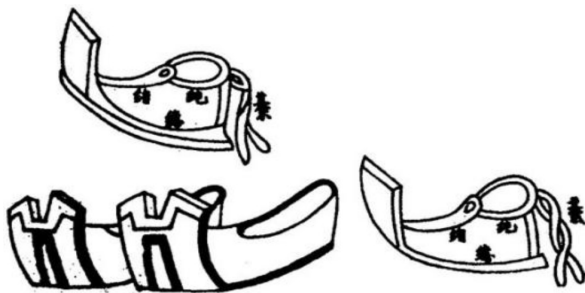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:舄(上)、天子赤舄(下)

图3:屨

2 染料植物与服色的政治意蕴

2.1 政治等级制度影响下的服色

周代服装是区分尊卑等级的手段之一。西周以前,人们制作服装的目的主要是蔽体遮羞、取暖御寒和美化装饰。虽然当时已经存在服装体现等级的现象,但是它们并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。不同以往,周代统治者有意使服装变成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。当时的服装文化秩序,以周天子和王后为主导,并且产生了奴隶社会象征政治等级体制的相关制度。^[15]

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周代社会,服装色彩体现出尊卑之别。按当时贵族社会的传统,人们多认为,“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是正色,象征高贵,正色是礼服的色彩;紺(红青色)、红(赤之浅者)、缥(淡青色)、紫、流黄(駟 liú 音留)是间色,象征卑贱,只能作为便服、内衣、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。”^[16]周代服色的贵贱之分,使染料植物具有了别尊卑的政治意蕴。

2.2 染料植物与区别贵贱的服色

冠是周代贵族阶层的一种头衣,染料植物染成的冠带之色区别了不同的社会阶级。《礼记·玉藻》记载:“玄冠朱组纓,天子之冠也。……玄冠丹组纓,诸侯之斋冠也。”^[17]在这段话中,天子和诸侯所戴的帽子均为玄色,但区分贵贱的是经染料植物染制的冠带之色。其中,“朱”为朱色,“丹”即赤色,这两种冠带颜色分别对应于天子、诸侯两个阶级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当时人们是用染料植物“茹蘆”来染赤的。《尔雅·释草》:“茹蘆,茅蒐”,郭璞对“茅蒐”的注释是:“今之蒨也。可以染绛。”^[18]茹蘆的今名为茜草,茜草之“茜”与郭注之“蒨”同音同部首,且它在《诗经》时代是一种红色染料,可见“茅蒐”即茹蘆。如前所述,经过三染的纁色即绛色。关于朱色,在对《仪礼·士冠礼》进行注疏时,有学者认同“朱则四入”的观点。^[19]所以,在周代,茹蘆是一种三染成赤色、四染成朱色的染料植物。由上可知,朱色不仅比赤色的染色工艺复杂,还在色泽上优于赤色。相比较而言,由茹蘆四染而成的朱色冠带更能表现天子的

至尊地位。^[20]

周代衣裳的色彩与染料植物的使用密切相关,同时体现出衣者地位的贵贱。在《周礼·天官》中,内司服掌管着王后的六种服装,即袞衣、揄狄、阙狄、鞠衣、展衣和缘衣,并辨别内、外命妇只能穿的鞠衣、展衣和缘衣三种服装。按照郑玄的注解,王后所穿六种服装的颜色依次为玄色、青色、赤色、黄色、白色和黑色,其中的玄色与黑色应属于同一色。如此说来,六服仅有五色,且均为正色。在未发明人造染料的社会,周人多利用植物染料对服装进行染色处理。依前文所言,蓼蓝用于染制青色服装,赤色则由茜草三染而得。而黄色服装可由荇草、鼠李和柘树三种染色植物染成。《诗经》共提及5种染料植物,且它们多用于染制能够体现不同社会身份的显贵之色。

3 染料植物与服色的审美意蕴

3.1 讲求调色的周代绘画与服色

在绘画上,周代社会讲求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五种颜色的调配。《周礼·冬官·画绩》云:“画绩之事,杂五色,东方谓之青,南方谓之赤,西方谓之白,北方谓之黑,天谓之玄,地谓之黄。青与白相次也,赤与黑相次也,玄与黄相次也。青与赤谓之文,赤与白谓之章,白与黑谓之黼,黑与青谓之黻,五采备谓之绣。”^[21]绘画与“绣”均注重五色的调配,而引文中却提及了六种颜色,按照贾《疏》的说法,这里的“天玄与北方黑,二者大同小异”。所以说,周人绘画讲究五色之间的调配是有文献作为依据的。

绘画中五色的调配方法,对服装的色彩搭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比如,赤色和黑色是两种顺次排列的颜色,周代服装对这一色彩调配方法均有所体现。在斋祭时,诸侯的头衣就是玄色的冠配以赤色的冠带子。在衣、裳颜色的搭配上,作为能够体现人们天地信仰观念的“玄衣纁裳”,即为服装中黑、赤两色组合的明证。此外,周人对王、王后在不同场合应穿何种舄色问题的处理,亦反映出其习惯于将赤、黑

二色予以搭配。那时,王的赤舄、黑舄必定分别与王后的玄舄、赤舄相配。周人的服色搭配方式,使得与服色相关的染料植物,除体现天地信仰和区别贵贱的意蕴之外,也表现出人们对色彩的独特审美意识。

3.2 染料植物与服色审美的意识

多种染料植物的使用,既丰富了服色的种类,又体现出人们追求色彩美的心理。原始社会中,由于染色技术落后,时人只能穿未经染色、单一色彩的服装。而黑色和红色作为生活中易得的自然色彩,广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。到了《诗经》所反映的历史时期,人们在自然界中发现了“绿”“蓝”“茹蘼”等多种染料植物。于是,这些天然植物便被用于染色,人类自此穿上了彩色服装。在染制布料的工艺上,彩色远比黑色或红色复杂。而且,色彩由少到多、由简至繁的转变,“更能体现出人对美的审视和把握”^[22]。

《诗经》中关乎染料植物的数首诗,体现出周人的色彩审美观。对《淇奥》中长势美盛的“绿”,王先谦把它与“质美德盛”的武公放在一起谈论。^[23]一方面,“绿”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植物染料,而为武公染制官服所用,因为人工煮后的“绿”枝叶可以染黄色衣物;另一方面,诗人用“绿”的美盛来比喻武公的美质和盛德,可见周人赋予黄色以一种高尚美好的意蕴。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^[24]一诗,在描写妇人的服装色彩时,出现了“缟”“綦”和“茹蘼”三个词。其中,“缟”指白色;“綦”是青黑色;“茹蘼”本是一种专供染制御服的红色染料,在此是用其指代诗中已提到的“巾”。妇人在服色上的搭配印证了绘画中的配色法。妇女的白色上衣分别与青黑色、赤色大巾相配。据绘画中的调色原则,现对其作如下分析:“缟衣綦巾”的组合方式,遵循了“青与白相次”“白与黑谓之黼”的服色审美喜好。“缟衣茹蘼”与“赤与白谓之章”的服色审美趣味相符合。而且,诗中所涉服色均是显贵之色,这足以见出贵族阶层在服色审美观念中

所起的导向作用。除此而外,“南山有枸,北山有楸”^[25]出现在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第五章的开头处。作为一句民歌习语,它的产生与当时人们的色彩审美观念相契合。在绘画的调色原理中,山的南面“谓之赤”,北面的山“谓之黑”,并且“赤与黑相次”,所以出现了南山、北山对举的说法。此外,在《诗经》时代,“楸”的未成熟的核果和树皮可以染出黄色和绿色。虽然“天谓之玄”,但玄、黑在色彩上无本质差别,于是有了“北山有楸”,即将玄、黄两种顺次排列颜色加以组合的习惯。

4 结语

《诗经》中的染料植物,体现了信仰、政治和审美等服色文化层面的内容,就此而言,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继夏、商之后,周代的经济在总体上得到了发展,以此为基础,统治者在宗法制之上推行了尊卑严明的分封制,周代的文化便在此历史背景中逐渐成型。作为周代文化典籍之一的《诗经》,其中染料植物所体现的服色文化意蕴,始终根源于周代的文化。由于周代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,因而,《诗经》中的服色文化亦是后者的一部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潘富俊.草木缘情: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:51-53.
- [2][3]潘富俊.诗经植物图鉴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3:143、275.
- [4]曹然.浅析中国古代自然崇拜对《诗经》中植物意象的影响[J].中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5(6):91-94.
- [5]雷晨.《诗经》植物意境研究[D].北京林业大学,2012.
- [6]王开元.《诗经》中的农耕文化[J].昌吉学院学报,2013(1):26-30.
- [7]王文锦.礼记译解(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:671.
- [8]范明华.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的美学向度[J].中

- 南民族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 2017(5):123.
- [9][17]王文锦.礼记译解(上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 2001:342、410.
- [10]高亨.周易大传今注[M].北京:齐鲁书社,1979: 562.
- [11]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: 745.
- [12]江冰.中华服饰文化[M].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9:34.
- [13][18]郭璞注,邢昺疏.十三经注疏·尔雅注疏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:152、233.
- [14]王先谦.荀子集解(上)[M].沈啸寰,王星贤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:1.
- [15][16]黄能馥,陈娟娟.中国服饰史(2版)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:5-6、91-92.
- [19]郑玄注,贾公彦疏.十三经注疏·仪礼注疏(上)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:8.
- [20]杨宽.西周史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: 476-479.
- [21]郑玄注,贾公彦疏.十三经注疏·周礼注疏(下)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:1115.
- [22]黄强.中国服饰画史[M].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7:14.
- [23][24][25]王先谦.诗三家义集疏(全二册)[M].吴格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7:265、367-369、597.

(责任编辑 周莉)